

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建构和解构

孙培军

提要 | 现代西方民主有其独特的话语叙事,在美好理想、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转中,民主呈现出“貌合神离”之状。通过对理想中的民主进行“定量”和“定性”建构,发现理想中的民主与设计中的民主相差甚远。设计中的民主与自由、宪政、共和等政治价值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设计中的民主与运转中的民主迥然不同,在制度安排上是偏好竞选的,民主已“名不符实、形神分离”,民主质量难以量化。解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可以发现西方民主的三大支柱被选举异化、行政集权和政党衰落所腐蚀,运转中的民主处于危机和转型之中。

关键词 | 西方民主 价值追求 政体模式

中图分类号 | D082

作者信息 | 孙培军,1983年生,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讲师,100091。

综观古今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实践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西方民主既是一种价值追求,又是一种政体模式。这一主线既建构又解构了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西方民主从哪儿来?”“现代西方民主是什么?”“今天西方民主怎么了?”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民主”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在前2300多年,它一直被当做是个“坏东西”。设计出来的民主制度与理想中的民主迥然不同,直到最近100多年来,“民主”才时来运转,被当做“好东西”。同时,运转中的民主使得民主制度设计已经大打折扣,“好东西”越来越“变质”了。

一、理想中的民主:西方民主从哪儿来

原初或本源的民主发端于古希腊,以雅典城邦民主为代表,其内涵很简单,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是所有的公民,统治是直接统治,所有公民都直接参与到城邦的决策和管理,这是一种最原始的直接民主。

1. 给民主“定量”

第一,“民”的数量多少。“民”不是指所有人而仅仅指“公民”,所谓的“所有公民”仅占城邦人数的很少比重。公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妇女、奴隶、外邦人都不是其组成部分,只有年满20周岁的雅典男子才独享公民权。以雅典全盛时代为例,据测算,享有充分权力的公民总数约有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此外,还有4万外邦人与35万左右奴隶,由此可以看出,公民人数仅占全部人口数的十一分之一左右。

第二,“主”的范围大小。“主”的范围很小,被限定在小国寡民的城邦里。城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仅仅是一个地理和人口概念。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地区,比较著名的有雅典、斯巴达。城邦面积狭小,包括卫城、市集、庙宇以及给男人用作浴场和体育训练场的“天体场”,雅典城邦全盛时期的人口也就在30~50万之间。不过,作为共同体的城邦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每个城邦都有特定的庇护神、庆祝的节日,不同城邦的

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也各有不同。现代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文的“城邦”(polis),意思是城邦的事务。城邦的这种地理、文化、宗教等要素彰显着政治的公共性特质。

2. 给民主“定性”

在古典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先贤不看好民主,很多近现代思想家也对民主持批评和审慎的态度。雅典城邦民主仅仅是诸多城邦采用的一种政体,但这不是治国理政的最好制度和办法。古典民主更直接地体现了“主权在民”“直接”等色彩,根本不具有现代民主实践运行中的议会、选举、政党这些关键环节。

首先,直接而非代议。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平台主要是公民大会,当时没有代议机构,“议会”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在雅典民主政体下,一般的会场可以容纳6000人左右,每年至少要召开40次大会,每次会期是5个小时。无论公私大事小事,4万公民中的6000人平均每隔不到10天就开一次会商议城邦事务。这种民主是参与民主的一种,政治是非职业化的。^①

其次,抽签而非选举。所谓的“直接”在形式上是随机抽签而不是选举产生议员和官员,没有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的限制。以五百人议事会为例,在预先准备好的罐子中放入与议事会席位相等的白豆和一定数量的黑豆,凡抽到白豆者为议员。公元前4世纪以后,抽签石盘替代了抽签罐。可以看出,抽签不同于选举,随机性更强,机会更平等。

最后,个人轮流而非政党竞争。在雅典直接民主制下,公民参与政治是通过个人轮流担任公职,而非组成政党去竞争职位,“党”是不存在的。每个公民都可以有机会轮流被抽为官员,报酬统一,任期一年,且不得连任,发展到后来,连报酬都取消了。议员任期一年,不得连任,公民一生最多可以担任两次议员。有意思的是,雅典存在一种陶片放逐法,这是一种逆向选举,谁被选上了,就

要被放逐。具体做法是在公民大会上对社会上的贤达人士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将那些有野心的、可能危及城邦福祉的、可能成为绝对权威或寡头的人放逐。这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人性的审慎态度,防止任何人长期垄断公共权力。

二、设计中的民主:西方民主是什么

西方民主是价值和政体的有机统一。民主是一种价值追求,是诸多核心政治价值的一个指标,体现了人们追求良好政治生活的一种目的。同时,民主又是一种政体,是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制度安排,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手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情境下,处于价值和政体之间的现代民主是以自由、宪政、共和等来限制民主,以政体来规训民主,在民主的“名”和“实”、“形”和“神”之间试图寻找平衡。

1. 作为价值的民主

在当今西方乃至世界,“民主”这个词语已经被“加冕”为好的价值和理念,民主成为一个“好东西”。这种价值论或目的论的西方民主被普遍认为与“自由”“宪政”“共和”等正面词语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一般意义的西方民主变成了“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民主”。不过,追根溯源,这些前缀词传递的信息是它们与民主有很大冲突性的,它们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的。

第一,自由与民主。西方民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这是为了防范民主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可能侵犯。到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家特别强调个人自由,自由不必然和民主是一致的,民主造成的“多数人的暴政”就是对自由最明显的褻渎。换言之,自由将民主拆解为“民”和“主”并对其加以规约,预设了哪些人是“民”,“民”怎么去“主”。从民主种类上而言,自由民主是与激进民主相对应的。

^① [希]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激进民主的典型是“直接民主”(所有人直接统治)，“直接民主”又与“间接民主”对应，“间接民主”的典型是“代议民主”(由代理人间接进行统治)。因此，在自由民主与激进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对应关系中，西方民主体现为自由的、间接的代议民主。这也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左—中—右”政治光谱，民主往往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如左翼民主观，西方自由民主是偏右的。

第二，宪政(共和)与民主。这里着重强调“宪政(共和)民主”在于突出西方宪政(共和)民主的特殊之处，即所谓的宪政民主是要对任何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为此，有了任期制、违宪审查、司法独立等制度和程序来规训民主，不让“任性的权力”在个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和组织手中肆意乱为，哪怕是为了保证结果的正义也不能亵渎程序的正义。其中，最重要的私人权益就是财产权，即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必须泾渭分明。所以，加上“宪政”“共和”这样的修饰词实际上是对民主可能滑向激进乃至极端的担心和不信任，西方民主在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间往往选择了程序民主，侧重程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实质上的经济民主，成为一种保护型民主。

2. 作为政体的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发展至今，与它直接相关的是选举，所以现代西方民主几乎与“选举民主”是同义词。从古典到近现代一路走来的西方民主，现如今最通俗的定义是采取自由、公开、竞争性选举(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的一套国家制度。熊彼特关于民主的经典定义是“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①。这成为西方判定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民主的最核心标准。

事实上，选举民主体现在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全过程中，其中“选举中”长期

备受瞩目，因为“谁选”“选谁”“怎么选”等“选举进行式”环节简单清晰地反映了民主。随着历史的发展，精英和利益集团在“选举进行式”中独占鳌头，精英民主制、多元民主制应运而生。这些类型的选举民主，最核心特征就是竞选，正所谓“没有竞争性的选举不是选举，没有差额的竞选不是竞选”。为了达到竞选，西方民主政治在制度上设计出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这三大支柱。这样，民主变成了“选主”和“为民做主”，变成了政治授权和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民主的适用范围被局限于此。

3. 民主的量化：“名”和“实”、“形”和“神”

有学者非常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作为价值和政体的民主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民主’都是经过改头换面的民主、去功能化的民主。经过‘自由’‘宪政’‘代议’‘选举’‘多元’一刀刀阉割之后，民主已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穷人已没法利用它来实现最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富人也没必要害怕这种‘鸟笼民主’，鸟笼内外依然是他们的天地。对有产阶级而言，既有唬人的‘民主’之名，又无可怕的‘民主’之实，这种玩意儿不是‘好东西’又是什么？”^②由此看来，民主是有质量的，作为一种制度也有制度绩效。譬如，制度设计得怎么样、制度执行得怎么样，怎么用一套指标去测量民主运转得好与坏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重点。

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学术机构、国家组织试图寻找出不同民主模式的相似之处，总结出民主的通行标准，对民主进行量化。西方学者一方面对民主进行“泛化测量”，认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7页。

^②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69~70页。

为法律条件、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资本、公民文化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指标；另一方面，欧美现代社会科学对民主进行“精细化测量”，试图建立分门别类的统计指标。民主测量逐渐形成了一些流行类型，如“自由之家”关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等级量表、经济学人情报社的民主指数、万哈宁民主指数、全球晴雨表调查、社会政治量表等。^①这些指数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各有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民主的量化是要对民主的“形”和“神”进行测量。“形”是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建构民主模板，测量某种模式是不是民主、民主程度如何；“神”是通过这些指标来测量民主的质量，民主实行的效果如何，进而也可以为民主转型和巩固提供参考，哪些条件影响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走向民主，哪些条件决定了民主实行的效果。

三、运转中的民主：西方民主怎么了

耐人寻味的是，民主政治在大行其道之外的景象是很多西方国家陷入了民主的危机和失灵。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此起彼伏，老牌民主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和政治衰败，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巩固不成功和不成熟，实行了竞争性选举的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出现“民主的回潮”，中亚国家进入既没有进入西方式民主又没有回到传统威权主义的“灰色地带”。我们从西方民主的选举、议会和政党这三大支柱来审视民主的危机和反思。

1. 选举异化

选举不是表面那么热闹和那么简单的，今日的选举民主已不是那么美好和那么有效的，人们对选举的“获得感”和“效能感”都大打折扣。

第一，选举的阶级性。“谁选”、“选谁”和“怎么选”不仅仅是一种程序和技术，在这些“选举进行式动作”行动之前，已经有了行动的理念和先导，其背后的蕴意是阶级性和经济性的。选举民主的阶级性是一直存在

的，精英和大众的分梳、穷人和富人的博弈、中产阶级的无力、利益集团的垄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民主必然具有“贵族”和“寡头”色彩。选举民主标榜的直选、普选、平等、公开的程序民主性，无法掩饰和弥补自由民主的实质阶级性。

第二，选举的经济性。在西方，政治献金、金融财团往往决定着选举的结果，金钱操纵着民主。2010年1月，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最高捐款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判定政府不得限制企业、工会投资选举宣传，取消了个人与企业向独立支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上限。这就是西方追求的民主金钱化而非金钱民主化的赤裸写照。民主政治堕落为政治营销，政治掮客、黑金政治、民粹主义、特殊利益集团、贿选拉票、筹钱推销在政治市场上大行其道。政治变成市场，选举民主变成金钱民主，宪政民主变成“宪财民主”。

第三，政治冷漠。《经济学人》2014年3月发表了《西方民主病在哪儿？》一文。报道称，发达国家的党员数量持续下降，现在仅有1%的英国人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2012年针对7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舆观（YouGov）公司针对英国选民的调查表明，62%的受访者认为“政客永远在撒谎”。^②这些数字表明，西方国家投票率日渐下降，民众陷入政治冷漠之中。

第四，选举后的治理。西方开始反思选举政治不能局限于“选举中”的凑热闹，“选举完了”不是万事大吉的，而对“选举前”和“选举后”越来越重视。选举仅仅是民主过

^① 这些指数只是一部分，关于其他指数的详细介绍和评议，参见肃草：《西方民主测量的局限性和迷惑性：概述与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② http://www.guancha.cn/JingJiXueRen/2014_03_05_210932_s.shtml。

程的一个环节,选举必须充分展现作为价值和政体的民主。这也关系到民主的质量,选举后这些人怎么治理国家、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西方选举的异化,一方面是因为选举自身的先天不足,包括选举理念和原则的欺骗性、选举的技术化操作,像在选票设计、选区划分、投票规则等上都可以做手脚;另一方面是因为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等民主理论和实践对选举民主的冲击和挑战,西方民主思想家一直在反思选举民主的不足之处。

2. 行政集权

传统意义彰显议会至上的代议民主已名不副实,行政力量日渐超越立法,西方民主已变成“行政集权民主制”,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议会民主已名不副实。

首先,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在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行政权力往往很强势,无论从政府首脑还是从行政部门的权限来看,国家权力结构由议会至上变为行政主导,政治的核心议题从立法领域转向公共行政领域,参与选举转向参与决策,“议会民主”实际上已经成为“行政民主”。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在2014年6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三权分立的机构,美国人的不信任程度创下了“历史新低”,美国国会支持率在2014年仅为7%,创下41年来的最低纪录。^①在这种情境下,科层制下的行政部门及其人员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又转化为行政首长手中,随之而来的是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权力腐败在所难免。近年来,西方政府的各种丑闻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次,行政自身。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行政权力不断积聚,另一方面现行的民主体制难以选出优秀的行政人员,特别是领导人的选任令人失望。以美国为例,拥有帝王般权力的总统现在沦为程序化、表演化和金钱化的选举,总统仅仅是通过电视、公关等政治竞选运动而被推上宝座的,其能力大小关乎甚小。此外,工作的单位本是最有必要和时

间最长的民主场所,但其民主状况也令人担忧,科层下的官僚制难以承担这种使命,工业以及工业领域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是所有普通人互相交往领域中最富有“政治性”的领域,工业领域中的决策对普通人的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工业领域的重要性体现为企业的规模可以允许个人直接参与决策,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地参与决策。^②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思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强调引入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对话,破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困扰。

3. 政党衰落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然而,今日的西方,政党这个载体在国家、政党和社会这三维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反对政治。在忠诚一反对政治的对垒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反对功效日渐衰退。不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逐渐暴露出相互拆台、效率低下、陷入党争、缺少共识等弊端,“轮流坐庄”恶化为“轮流分赃”,成为“一届隔着一届干”。^③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国家曾陷于党派之争,甚至曾濒临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尤其是在欧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主流政党结成政治卡特尔垄断国家权力,党的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员数量不断下降,无论他们怎么宣称全方位党,但“政党卡特尔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政党本源上也是作为社会组织存在的,却被嵌入到国家机器中,政党政治化

^① 《美国民调:“美国国会支持率创41年最低纪录”》, http://msn.people.com.cn/n/2014/0622/c242548_25183026.html, 2014-06-22/2014-9-30。

^②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③ 苏长河:《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5—6日。

和国家化了。^①

其次,功能弱化。西方国家的政党吸引民众的传统伎俩已无济于事,在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员招募、活动经费、党内法律法规都处于转型和调适之中,其功能要么发挥不力,要么处于虚置,政党难以真正运转起来。一些极右政党初露端倪,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在大选中的得票率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勒索的极右倾向主张让政治观察家们忧心忡忡。与此相对应地,人们不再必须借助政党这个桥梁参与传统常规政治,对其冲击的是一些非常态的参与手段,特别是作为非制度化政治的社会运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其与制度化的传统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交互关系。国家、政党、社会运动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共同作用于斗争政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②最近这几年在欧美一些国家也兴起了很多社会运动,像欧洲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抗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激进化、非常规的政治蚕食着政党政治的领地。

四、结 语

通过建构和解构西方民主的话语叙事,可以警醒地发现,西方民主实际上已经名实分离,要区分理想中的西方民主、设计中的西方民主和运转中的民主,防止把前两者混为第三者,民主思想史和民主实践史处于不断磨合中。

“西方民主从哪儿来”的故事片段告诉我们,西方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审视,其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的纠结一直存在。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民”的数量经历了从少到多、“主”的范围从小到大等多向度运动中,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原因,在直接还是代议、抽签还是选举、个人轮流还是政党竞争等民主环节上,古今西方民主作出的抉择是截然相反的。

“西方民主是什么”的故事片段告诉我

们,作为政体和制度的西方民主,在名称上与“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紧密相关,但在实际上,民主受到自由、宪政的规约,它们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同时,西方学者尝试设计出测量民主质量的各种指标表明,西方民主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指标少之又少,是要付诸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操作并经受检验测量的。

“西方民主怎么了”的故事片段告诉我们民主不单纯是抽象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而是具体的制度、生活,不管西方民主自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还是陷入选举异化、行政集权和政党衰落的困境,表明西方民主从理想变成现实本身就不是尽善尽美的,它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和弊端,必须在制度、体制和机制上不断试错、纠正和成熟。

(责任编辑:张 莉)

^① 张飞雪:《“卡特化”与西方政党政治的走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2期。

^② [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